

要案侦查员

[苏]



要案侦查员

[苏] 阿纳托利·别祖格洛夫

程文译

重 庆 出 版 社

一九八五年·重庆

别祖格洛夫和他的“法制小说”

在苏联文学中，以法制教育为题材的小说一向占有很大比重。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苏联世风的变化，这类作品作为一种对人民群众进行法制教育，惩恶扬善、针砭时弊，培养人们的正义感、公民责任感和道德观念的通俗文学体裁，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重视。出现了许多专门发表这类作品的刊物和丛书，许多作家，包括一些卓有影响的著名作家，都时有这类作品问世，实际上形成了一个新的文学门类——法制小说。

“法制小说”多是以现实社会中道德与法律之间的各种尖锐的矛盾冲突，如道德与犯罪、罪与非罪、社会犯罪的根源以及罪行对策学等为题材，针对一些最为人们所关心的、具有迫切时代特征的社会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和哲理性探讨。在艺术表现上比一般的道德探索小说更注重故事情节与严密的结构和推理、悬念等手法的运用。但与那些单纯靠编造耸人听闻的离奇故事、玩弄超人的诡辩技巧，甚至靠色情暴力刺激吸引读者的西方侦探小说根本不同。它严格遵循着

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有着鲜明的的是非观念，尤其注重积极的正面教育作用。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群众对社会邪恶势力的义愤和不满。

阿纳托利·别祖格洛夫是苏联一位卓有影响的法学家，又是一位在创作上有独到见解、艺术手法上不落窠臼的法制小说作家。《要案侦查员》是一部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作者的创作宗旨和艺术风格的作品。

别祖格洛夫于一九二八年出生于苏联元帅布琼尼的故乡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小镇。父亲是国内战争时期红色游击队的著名将领、布琼尼的战友。革命传统教育对别祖格洛夫的成长有着深刻的影响。

别祖格洛夫在萨尔斯克大草原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战争中断了他的中学生活，迫使他迁移到梯比里斯继续学习，并在那里加入了共青团。一九五〇年毕业于莫斯科法学院。毕业后至一九五六年在苏共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系学习。此后在苏联科学院国家法制研究所从事法学方面的普及教育和研究。一九七一年获法学博士学位。出版过大量法学理论和罪行调查学、犯罪对策学方面的专著，其中有的被译成多种外文在国外出版。他是苏联许多重要法律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并是苏联中央电视台“人与法”专题讲座的主讲人，是苏联当代著名的法学家和社会活动家。

别祖格洛夫的文学创作开始于一九六〇年。当年发表了两部小说：《意外的证据》和《柳暗花明》。以后又陆续发

表了《谁的错？》（1962年）、《怪人？情人……》（1965年）等。上述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检察院的侦查员。他经常和尤里·克拉罗夫合作著书。他们合著的长篇历史惊险小说《希特罗黑市的末日》（1967年）给作家带来了巨大荣誉。苏联评论界称这部小说是当时同类题材作品中的“优秀之作”（《十月》，1967年第7期），在俄罗斯内务部文学评选中获优胜奖。以后他们联合发表的主要作品还有反映新经济政策时期莫斯科刑警局反刑事犯罪斗争的小说《铁路管辖区》（1969年）和《未遂罪》（1973年）。后一部作品（已由北京出版社于1984年翻译出版，改名为《侦查员的良心》）与别祖格洛夫的两部以侦查员为主人公的小说一起组成为“侦查员三部曲”。别祖格洛夫个人发表的作品还有小说《您将被称为迪科斯》（1970年）、《捕蛇者》（1972年）和《检察官札记》（1983年）等。

别祖格洛夫以他精深的法学理论修养和多年的实际工作经验，使他的作品具有牢固的法学根基。他笔下的传统主人公侦查员形象都是敢于直言极谏，中立无所倚傍，重事实，重调查，悉心研审，凭证断案，援引法律恰当而不拘泥，惩处罪犯严而不过，表现出依法行事、办案不拘一格的品格。因此，他作品中的侦查员形象不仅受到读者的喜爱，而且在法律专业教学中常常被引为范例。

别祖格洛夫首先是一位法学家，文学创作上的成就是他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严肃责任感的体现。他崇尚主人公的责

任感、原则性和“只有通情才能达理”的职业道德，反对人物形象的模式化和神奇化。他在《在严厉判决的背后……》一书中说：“我不是侦探小说的爱好者。无论如何，我不欣赏那些侦探推理小说，姑且不论它算不算文学作品，它们往往只是描写我们工作的一个方面——分析罪证，推理断案，而且念念不忘把在罪行调查学方面早已不足为训的福尔摩斯的一套手段强加于我们。更有甚者，侦查员经常被表现为猜谜的机器。侦查员是人，而不是机器。侦查员的职业是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我深信，任何一部精密的机器，即使它也以优异的成绩学完法学院的全部课程，掌握了侦破任何疑案的全部技能，最终仍然取代不了一个侦查员最主要的方面——他对自身工作亦即根除社会犯罪现象的极端必要性的坚强信念，他的公民责任感和原则性。侦查机器与这种深刻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崇高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机器就是机器，它没有任何通情达理可言。”

别祖格洛夫在创作中忠于自己的艺术原则，致力于深入体察笔下人物性格上的隐秘，他不是仅仅以耸动人的情节去吸引读者，而是着力于人物行为的心理剖析。他认为法制小说作为一种文学体裁，它只有在不失其社会意义及理性本质，只有把注意力放在发展人物个性的情况下才能成立。他在一九七一年《文学报》举行的一次文学创作讨论会上阐述自己的艺术原则时说：“对我来说是明确的，我的小说的情节决不仅局限于侦查员的个人行动，不管这个侦查员有多么高明……”“只有把侦查、通讯仅仅作为作品的背景，在这

个背景上去充分展示人的命运，只有作家致力于社会现象的调查，致力于反映发生在现实社会中的深刻复杂的社会问题及其动向，这才是真正的文学。”小说《要案侦查员》正是这一艺术原则在创作实践上的体现。

《要案侦查员》描写的仍是别祖格洛夫笔下的传统主人公——侦查员。小说以侦查员契库罗夫调查一名妇女死亡案件的始末为线索，广泛涉及了当今苏联的社会现实，突出展现了与刑事犯罪息息相关的社会道德问题。小说写于七十年代末，字里行间都带有苏联社会的时代痕迹，处处都可以看到苏联现实社会的世态人情，时尚风貌，当代苏联人的思想、性格和心理上的变化，触及到了社会生活的脉搏和动向。

小说有着起伏跌宕、引人入胜的情节，但更加深刻感染着读者、引起读者强烈的感情共鸣的，还是展现在作品中的世态炎凉和各类人物的不同命运：天真善良的安尼娅的人生悲剧；娜嘉的身世以及她和侦查员契库罗夫的爱情纠葛，安尼娅的女友玛丽娅的不幸遭遇，共和国副检察长伊万·瓦西里耶维奇与其岳母相依为命的孤苦晚年，瓦列里轻浮的处世和自己造成的悲惨结局，青年司机斯塔尼斯拉夫的玩世不恭，总农艺师依里因对爱情、对事业的执着追求而招致的种种打击，以及侦查员从各处听到的“现在为什么到处都是尔虞我诈、敲诈勒索？”的浩叹……等等。读者从中可以看出当今苏联社会人们之间的关系、家庭结构和伦理道德，以及青年一代人生观和对待爱情、婚姻、家庭观念等方面的变化。家庭关系松散的受害者首先是老弱妇孺：侦查员所到

之处几乎都碰上孤苦无依、晚景悲凉的老人，被玩弄、欺骗后抛弃的妇女和失去抚爱、教育的儿童。作者通过今与昔、善与恶、大公无私与自私自利广泛的对比发出了世风日下的感慨，并通过剖析社会风气对人的心灵的侵蚀从而隐约指出了刑事犯罪的社会根源。作者以主人公契库罗夫本人的恋爱情节作为衬托并借以表达自己对婚姻、家庭和社会生活的看法，使作品更加亲切感人。

作品还通过侦查员在执行任务中屡遭干扰反映了苏联社会存在的又一矛盾——特权与法制的矛盾。如当事人扎列斯基的父亲是俄罗斯联邦一位有名望的律师，过去他就曾利用职权包庇过一个走私犯，给社会留下了隐患。现在，当法律危及到自己儿子和他本人的尊严，有碍他的家庭声誉的时刻，他又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上书检察院，同时促使一家中央报社派出记者对侦查员进行反调查，施加压力，力图中止此事，维持原案。由于新的证据将说明当初的定案是错误的，这又引起了原经办此案的当地内务局一侦查处长对契库罗夫的忌恨。他向共和国检察院无中生有地反映契库罗夫行为不检，企图迫使他回避。唯一领导和支持契库罗夫彻底查清此案的共和国副检察长依万·瓦西里耶维奇，却又恰在这时，在他还年富力强的情况下突然退休……这都给侦查员契库罗夫造成了一系列人为的困难。但是在侦查过程中接触到的大量的人和事，使契库罗夫更深刻地理解了生活，在应该如何对待自己的事业，如何处理自己的恋爱婚姻问题上受到了启迪，从而促使他终于排除重重干扰，审慎而又周密地把

工作坚持到底，查获了凶手，使全案真相大白。

别祖格洛夫遵循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塑造了一个脚踏实地、不带丝毫神奇色彩、真实可信的侦查员形象。不过他毕竟是苏联现实社会中所产生的一个艺术典型，因此就其对待爱情、婚姻、家庭等等问题的态度看，是以苏联社会的道德规范为准绳的。这一点，相信读者自能鉴别。

译 者

一九八四年三月·北京

主要人物表

伊戈尔·安德列耶维奇·契库罗夫——俄罗斯联邦检察院要

案侦查员

娜杰日达（小名：娜嘉）·玛克西莫芙娜——服装设计公

主任设计师，伊戈尔的“同居妻子”

安格丽娜（小名：安尼娅）·谢尔盖耶芙娜·扎列斯卡娅

（本姓：基尔桑诺娃）——“灯塔”国营农场幼儿园保

育员

瓦列里·格奥尔吉耶维奇·扎列斯基——安尼娅之夫

尼科莱（小名：科利亚）·戈尔捷耶维奇·依里因——安尼

娅的同学，男友，农场总农艺师

叶梅里扬·扎哈罗维奇·穆尔津——农场场长

依万·瓦西里耶维奇——俄罗斯联邦检察院副检察长，后退

休

爱德华·阿列克谢耶维奇——检察院侦查局副局长，后代理

副检察长

库库耶夫——阿尔泰边区北湖区内务局侦查处副处长

谢拉菲玛·卡尔波芙娜·依先科——北湖区内务局侦查上

尉，区内务局派给伊戈尔的助手

叶甫盖尼·里涅夫（小名：热尼娅）——管区检察员

加丽娅·里涅娃——场长秘书，热尼亚之妻

帕维尔·叶夫多基莫维奇·扎依采夫——北湖区执委会副主席

萨维里·福米奇——农场办事处看门人

斯塔尼斯拉夫（小名：斯塔西克，外号：疣子）·科洛莫依采夫——农场司机，业余画家，瓦列里之友

叶夫多基娅·德米特里耶芙娜·玛秋申娜——科洛莫依采夫的房东

安菲萨·谢苗诺芙娜——安尼娅的养母

阿格涅萨·彼得罗芙娜——娜嘉的领导

尤里·尤里耶维奇——区执委会文化科视导员

齐波夫——农场俱乐部主任，电影放映员

康斯坦丁·帕申科（外号：格罗梅绍克）——农场前任总农艺师

维亚切斯拉夫·谢尔盖耶维奇·雅申——法医鉴定师

玛尔加丽塔·费多罗芙娜·吉霍米罗娃——语言学博士

格·谢·扎列斯基——瓦列里之父，某州律师公会主席团成员，著名律师

玛丽娅（小名：玛莎）·尼康诺芙娜·扎夫拉日娜娅——农场幼儿园保育员，安尼娅的女友

索菲娅（别称：索福丽娅）·依里因契娜·雷布金娜——安尼娅的邻居

安德列·维肖拉戈——北湖镇司机

若拉·内尔科夫——上戈德斯克安尼娅故居的买主

叶卡捷琳娜·帕夫洛芙娜——副检察长依万·瓦西里耶维奇的岳母，画家

伊丽娜·达维多芙娜·帕丽依——退休歌舞演员，瓦列里女友

兹拉托夫拉特斯基——中央某报记者

费多尔·吉洪诺维奇·萨夫丘克（化名：达尼洛夫）——在逃犯

亨里赫·瓦西里耶维奇·格拉兹科夫（绰号：货郎）——瓦列里之父格·谢·扎列斯基包庇下来的走私惯犯，瓦列里的朋友。

中南工业大学

我一向很忌妒那些体育迷。从内心里忌妒而又无可奈何。他们都有强大的后盾，得天独厚。您瞧吧，为他们建设那么多可容纳下全城居民（甚至整个国家，譬如象蒙的卡罗^①）的宏伟的运动场和豪华的体育馆。

有时我还觉得连电视也是专为他们发明的。不信您看看电视节目报，很少有哪一天没有足球、冰球或者水球、摔跤、举重等各种比赛……碰巧不定哪一天同时就有几种球赛。

我这种忌妒心情并不因我也有自己的爱好而平息。为这种爱好伤脑筋的人多着呢。这也不难证实：要不信，当斯梅尔特诺娃演《吉赛尔》，或玛克西莫娃和瓦西里耶夫^②合演《斯巴达克》时，您去搞张大剧院的票试试。

当你手里攥着这张珍贵的裁成小条的普通纸片，从围在这座堂皇的剧院门前的失意人群中挤出来时，有什么能比得上你此时此刻的得意心情呢？照例，你已经是这唯一的、无与伦比的艺术的目击者了。尚且不说在期待着奇迹即将出现

① 摩纳哥城市，地中海南岸的疗养地，人口不到一万，以拥有巨大的赌博性的跑马、竞技场而闻名于世。

② 都是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当代明星。

的那种壮严而激动难耐的气氛。

所以，对《费加罗的婚礼》中基布卡洛的演唱我简直不能不听，我没有权利放弃它。

中央售票处的票，不用说，已经没有了。我还想直接到大剧院去碰碰运气，说不定还有希望。

我只好一大早就起来，叫辆出租汽车（地铁还没开）到大剧院售票处去。司机知道乘客这么早要去什么地方之后，不禁惊异地看了看我。可当他看到象我这样的“神经病”已经聚集了一大堆的时候，他又同情地摇了摇头。

随之我又担心：票究竟还有没有呢？票倒是有，只有三个星期以后的了。但这也算幸运……

等到演出的那一天，我一早就象参加“盛典”似的打扮就绪，因为从我下班到开演，中间只有六十分钟时间，就这点工夫，从我的工作单位（俄罗斯联邦检察院）所在地库兹涅茨桥赶到巴布什金大街住处，穿戴一番，再返回到城中心去，那是不可想象的。好在我的机关离大剧院步行只要十分钟就够了。一切都得按时刻表进行。

下午四点，娜嘉来电话问原定动身时间有没有改变。

娜嘉工作的地方就在我们检察院旁边——服装设计公司。这是我第一次（但愿也是最后一次）交上的一个“萍水相逢”的朋友。我们是在中央美术工作者之家餐厅认识的。在我们还没尝过这里的肉汤、点心和牛排，一时还不知道该点什么菜的时候，我和她曾不止一次地互相传递过当日的菜谱。

看来，她很想和我作些进一步的接触。但不知为什么，

她和我接触的方式总使我琢磨不透。我们谈话的时候，她老是打岔儿，说什么因为安装施工，经常在他们设计室周围挖沟，把电话线缆都破坏了等等。

我曾婉转地向她表示，人直接的交往比电话联系好得多。可她总是谈她的电缆、安装施工……之类。后来，无意中我发现，娜嘉原来把我当成了一个电讯工作者。不错，有一个时期，我们检察部门的人也佩带过肩章。现在，我们的标志只有一副带几颗小星星的领章了。

当她了解了我现在真正的职业之后，显然对我更敬重了。我也因知道了她并不是一个时装模特儿而更感到高兴。的确，一个服装设计师，本身又具有时装模特儿的标致身条儿，这对男人来说是很有诱惑力的。后来知道，最初她确实当过模特儿。那有什么呢，我也并非一开始就是个侦查员的……

那天，我告诉娜嘉，原来约定的时间不变。这就是说，她马上向她的领导（就是我在电话里已经熟悉了的那位阿格涅萨·彼得罗芙娜）请个假，回家换衣服，赶到左数第一根圆柱跟前碰面。

下午五点钟，医院里有人给我来电话。给我看病的耳鼻喉科大夫说，明天门诊部有床位。这是件值得高兴的事。心里这么想着，也就在电话上顺口说了。可是当我把听筒一放，又觉得一阵心悸，很不是滋味：拿解剖刀刺你的喉咙，这有什么可高兴的？唉！

有什么办法，也该下这个狠心了……

五点一刻，法依诺奇卡来我办公室看了一下。一个翘鼻

子、长着一头栗色卷发的洋娃娃。共和国副检察长的秘书。

法依诺奇卡到这里工作没多久。她报考过函授法学院，没有考上。但她又一心要搞法律学，于是就来检察院工作。她穿着一件很平常的连衣裙，包括她的言谈举止，整个看上去都很天真自然，又富于人情。看着她，我不禁为她感到伤心：难道她也甘愿把自己禁锢在这种点头哈腰、不冷不热的秘书礼节之中吗？

“伊戈尔·安德列耶维奇，依万·瓦西里耶维奇请您下班后到他那里去一下。”

我的电话经常占线。领导上有事找我的时候，她总是不嫌麻烦地爬二层楼上来找我。

她很腼腆，一说话就脸红，但还是来。不过，在餐厅里（如果我来不及去中央美术工作者之家的话）她从来也不坐到我的桌上来。这也成了人们的笑柄。我的一些同事很喜欢拿这事来开玩笑，常把姑娘羞得满脸通红。

“现在依万·瓦西里耶维奇忙着吗？”我问道。

“他根本没在屋。到部长会议去了。反正您得等他一会儿。他请您……”

“他请我，”我说，“比向我下命令还厉害。”

法依诺奇卡耸了耸小鼻子，意思是说：我也爱莫能助啊。趁她还没带上门，我请求她：

“他回来，请您马上给我来个电话好吗？”

“一定，伊戈尔·安德列耶维奇。”

说罢，那个头发蓬松的脑袋就消失了。

这么说，明天十二点以前就得赶到医院。得带个简单的旅行袋。大包小包，电动刮胡刀，牙刷……准备去住院已经准备了一年多了，没想一下这么急——明天就得去。半天的时间，还得处理许许多多的事。得打个电话给洗衣房，告诉他们洗的衣服先不要送来。一定记着把合作社的杂费交了，都拖了两个月了。工作上好在没有什么急事。一个星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错，我听说手术之后有一段时间不能讲话。多长时间呢？这得问问清楚。哑巴侦查员——那算什么侦查员……

还差一会儿到六点，我没等法依诺奇卡来电话就下楼来到了副检察长接待室。

依万·瓦西里耶维奇还没回来。女秘书挺难为情，仿佛首长不在是她的过错。

当然，一到六点整，我，和大家一样，离开办公室就是合法的了。制度是制度，可事实上呢……我不知道有没有对领导的要求置之不顾的人，但对我来说，循规蹈矩说不过去。我的工作日并不象人家那么正规……我按照吩咐，愁容满面地坐在法依诺奇卡桌旁的一张扶手椅上等着。

姑娘继续灵巧地敲打着打字机，不时地向我投以歉意的目光。大概，她认为自己应当跟司机一块下班。要走也得经过首长的许可。

今天，她也可能是为了我才留下来的，怕我一个人呆在这里寂寞？……

等到六点一刻，我开始发愁了。